**时文美文**

**2017-05-20 高二（下） 第5期 本期主编 春夜喜雨**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高二语文备课组**

**汪涵拯救方言 VS 李光耀消灭方言**

知名主持人汪涵自掏500万保护方言，一句“普通话让你走的更远，方言让你记住你的根在哪里”，击中了很多人的乡愁，“保护方言”的呼声获得了广泛的共鸣。

这些共鸣之声里，编制方言辞典、录制方言音像资料，筹办方言博物馆，均属于“保护方言”的应有之义。但另外一些共鸣之声，比如“将方言纳入学校教育”、“要让孩子们学会说方言”……则已走上了“推广方言”的歧路。试举两例言之：

案例一：大陆推广“壮文”失败

1954年，政务院批准了《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报告》，决定帮助那些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或通用文字的民族，创造或择定一种适用的拼音/字母文字；并责成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等相关机构，先“订出在一两个民族中创立文字的具体方案，开始在一两个民族中逐步试行。”①

显然，这是一项非常有助于“保护方言”的政策。方言的生命力，固然主要取决于使用人数的多寡，也与有无文字作为“载体”关系甚大。无文字只靠口口相传的“方言”，传承性显然不如有文字、有教材、能够进入学校教育体系的“方言”。**事实上，在中国出台上述政策之前，基于“每个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这样一种理念，苏联已经“为40个只有语言而没文字的少数民族设计了文字，编了语法和字典”。**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下，至1956年底，中国南方创制出了壮文、布依文、彝文、苗文等共计7种拉丁字母文字；北方采用斯拉夫字母，也创制了一种达斡尔文字——当时，亦正在进行以“拉丁化拼音”为方向的汉字改革，其终极目标是废弃方块汉字，实现汉语的字母化。

具体以“壮文”为例。广西历史上曾有过仿汉字的“土俗字”，属于方块文字，各地区不统一；新制的统一壮文，则属于拉丁字母文字。1955年10月份，“**在苏联顾问（谢尔久琴柯）的帮助下……确定了广西壮文的基础方言和标准语音。**”③新壮文“决定选择……壮语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靠近首府南宁、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武鸣县双桥乡的壮语为标准音”。④1957年，新壮文获国务院批准通过，正式推行。

此后60年间，政策上对壮文的扶植颇多。1957-1966年间，“壮文扫盲”290万人，52个壮族聚居县建立了壮文工作机构和壮文学校，培训壮文骨干超过64000人。编译出版壮文图书430种1044万册，出版《壮文报》1028期。《人民画报》、《民族画报》出版了壮文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有壮文广播，民族出版社设有壮文编辑室。广西各级机关单位的公章、牌匾及公共场所的路标、站牌，均使用壮、汉两种文字书写。1980年后，上述扶植政策再度复苏，对50年代创制的壮文也略有修订。许多壮族地区小学推行“以壮为主、壮汉结合”的双语教学、广西电视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每天都有“壮语新闻”、“壮语广播讲座学校”等节目；广西民族大学开设有壮语文本科、研究生专业，中央民族大学亦设有招收壮语文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专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人民币上一直印有壮文。⑤

如此这般的推广力度，其结果如何呢？1998年，广西语委组织了一次全省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于2000年底完成数据的录入、整理工作。共计抽样调查户数13596户，覆盖90个市县956个街道/乡镇。结果显示：

“除个别少数民族如彝族外，广西的少数民族传统上都是使用汉字，所以尽管上世纪50年代后国家为广西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创制了文字，但应用还是很有限。**以壮文为例，调查材料中懂壮文的仅有127人，其中壮族97人，只占调查材料中壮族人数的2.35％**(本次抽样调查的人户主[一户一人]调查对象共13596人，汉族占43.3％，壮族占30.3％)。**而懂壮文的人中会读会写的又只有44人，多数还是会读不会写。而经常写的仅有6人，有时写的也只有19人。**认为壮文将来会有很大发展的只有6人，认为有局部发展的有18人，人数都非常少。”⑥

调查提供了一组很奇特的数据：被调查的壮族人中超过90%仍在使用作为方言的“壮语”；但却只有2.35%的人懂得“壮文”；同时，92.9%的被调查者（包括汉、壮及其他民族）认为中小学教学最好使用“普通话”。

显然，包括“进入学校”在内的对壮文的强力推广，是失败的。

案例二：新加坡废弃方言、推广“华语”成功

1979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起了一场“讲华语运动”，其目标是以“华语”（近似于大陆的普通话）取代盛行于新加坡的包括福建话、广东话等在内的各种“方言”。

为什么要这样做？李光耀如此解释：

“1979年，我56岁那年，为了推动讲华语运动，鼓励新加坡人放弃方言，把华语说好，我以身作则，放弃20年来说的一口流利的福建话，这对于一个深明方言是赢得选票武器的我来说，是一项痛苦的抉择，但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看清了方言只是地方性的语言，它有很大的局限。……**在我们这个迅速发展的社会里，如果还迷恋方言的‘亲切感’，那是很不明智的。假设我继续以福建话保住我的政治资本，让新加坡人到今天还说方言，新加坡今天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我不敢想象。**当科技进步，交通工具和通信器材越来越发达，世界越变越小的时候，人类其实需要越来越少种类的语言，每个国家都在减少需要学习语言种类的数目。……我早在30年前就已经看清方言是种‘穷途末路’的语言，它绝不是时代的对手。”⑦

新加坡是一个讲“福建话”的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也是一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为什么不让新加坡的华人，直接以“福建话”或者英语为统一语言呢？

**针对“福建话”，李光耀的解释是**：“很多人对我说，既然英文是新加坡人谋生的用语，中国福建话是新加坡人的生活语言，我为何不就顺其自然，让中国福建话像中国香港的广东话，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呢？而事实上，自战后，中国福建话已经逐渐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通语。但是，它不像中国香港的广东话，水平很高，整个中国香港讲的只是广东话一种方言，我们却是讲12种方言混杂在一起的福建话。香港人在学校用广东话读书、游戏、开会、辩论、创作。如果我们的福建话有中国香港广东话那样的水平，也许任由它留下来是一个选择，因为那是高水平的语言，可是，新加坡的福建话却是粗俗的，是没有文字的。新加坡华人要发展，必须选择一种有价值、高素质的语言。”“我绝不要……让一种难懂的福建话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让它干扰我们努力推行的双语教育，让它分裂新加坡的华人社群。”

**针对英语，李光耀的解释是**：“我们永远无法使英语成为最底层人民的日常用语，我们只有努力推广华语，使这些人所掌握的唯一语言是有文字的华语而不是没有文字的方言，尽量不成为文盲，这是推广讲华语运动的目的。”⑧

为了让民众学习“华语”，新加坡政府软硬兼施，采取了很多强制、半强制性政策。比如，要求华族公务员在柜台与华族公众接触时，须用华语交流，40岁以下不会说华语的公众，其事务只能留待最后被受理；华族公务员必须华语口试及格才能被擢升；禁止电视台播出方言广告，淘汰所有方言节目，打造纯华语频道，粤语热播剧如《倚天屠龙记》须配音成华语才能播出……

强制推广“华语”10余年后，一种华语圈里的新方言——混杂了马来语、方言和英语的“新加坡华语”——逐渐有了成型的趋势。有些人认为这是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的结晶，应该保护。但李光耀不这么看：

“这对语言学者来说也许很有趣，但对社会发展没有丝毫价值。我们学英语是为了沟通，为了让世界了解我们，也为了让我们了解世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别语言？华语也一样。**我们应该尽量达到标准的水平，让所有的人，不管是在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还是在美国的华人都听得懂，而不是保留一种只有新加坡人才听得懂的语言。我不明白我们的华语为什么要标新立异？除非我们像美国，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才有说美式英语的条件。我们人口只有300万，没有必要编自己的华文词典。我们如果说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没有人能听得懂的新加坡式华语，好像说‘暗语’那样，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当然要净化华语，要学一种能让13亿多中国人以及全世界华人都听得懂的华语。”⑨

不过，重视“华语”，并不意味着“华语”在新加坡的地位与英语并驾齐驱，甚至高于英语。尽管李光耀声称“华语运动”的使命“是通过华语来保存和传播（中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加强华族新加坡人的认同”，但他同时也强调，如果认为这项运动“是要用华语来取代英语”，那绝对是一种误解：

“英语是我们谋求生存、温饱、发展的语言，我们不会放弃英语而以华语取代它。”“只要英文继续是新加坡学校的第一语文，无论新加坡人说多少华语，英语永远比华语更重要。我们的小学教学70%的时间用英语，中学教学80%的时间用英语，大学教学100%用英语，这是不会变的。”⑩

事实上，新加坡的华语教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语、文分离”，拼音的学习高度优先于汉字的书写，很多华人口语流利，但书写能力严重不足。在一些中国“汉语教育学者”眼中，这是新加坡华语教学的一大缺陷；但这种“缺陷”，恰是新加坡当局的政策引导的直接结果。

尽管李光耀晚年对新加坡讲华语家庭越来越少感到忧虑，但总体而言，其消灭方言、扶植华语、但又不妨害英语作为第一语文地位的政策，可以说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方言可以保护，但不应推广，更不应进学校戕害儿童

大陆推行“壮文教育”失败，李光耀推广“华语教育”成功，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

**壮族的“壮语”，相对于第一语文普通话，可以说是一种方言；新加坡的“华语”与马来语、泰米尔语并列为官方语言，但相对于同为官方语言的第一语文英语，也仍可以说是一种“方言”（并非华人外的其他族群的通用语言）。**新加坡在六十年代选择以英语为第一语文，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当时的“华语政治/经济圈”过于逼仄；为生存计，新加坡必须融入“英语政治/经济圈”（英语能消融国内族群矛盾，也是主要原因之一）。（11）1998-2000年的调查，显示广西地区绝大部分的壮族，仍希望中小学教育最好使用“普通话”，也与“壮语经济圈”规模有限有关；为生存计，最好的选择是融入“汉语经济圈”。

李光耀消灭新加坡的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代之以新的来自中国北方的“华语”，相当于在新加坡创造了一种新的“统一方言”。新“方言”消除了新加坡华人内部沟通中的许多隔阂，故能成功普及。但对广阔的“英语政治/经济圈”而言，这种“方言”意义并不大，故新加坡政府亦只将推广的重点落在口语训练，对文字书写则不予重视。大陆创造并努力推行“壮文”，则恰颠倒了重点——“壮语”作为一种“统一方言”（尚有南北之分）已足可支持内部交流，而学习“壮文”对融入“汉语经济圈”并无意义——最终落得仅剩2.35%的壮族人懂得“壮文”，实是情理中的事情。

1980年，新加坡讲华语的家庭只有26%，到1988年，这个数据达到了69%。这样的增幅，除了当局的推广之外，显然也与“汉语经济圈”的崛起有关——李光耀明言：“直到中国经济崛起，向新加坡英文教育者证明通晓华语是有经济价值的，他们才知道学习华语的重要性”。进入90年代，新加坡以华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数量开始骤减，1998年只有56%，到2009年只剩下40%。相反，以英语为主要家庭语言的比例，则从1990年的26%上升到了2010年的60%。面对这种时代变迁引致的升降变化，即便是李光耀，也已承认自己无能为力。（12）

综上，简言之：

**1、“保护方言”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们记录下来，存入博物馆。**

**2、不要去“推广方言”。**方言之所以成为方言，正在于其竞争力不如主流语言。面对强势的“汉语经济圈”，一千余万人使用的“壮语”尚且无法实现文字的普及；面对强势的“英语政治/经济/文化圈”，七成以上人口系华人的新加坡，尚且无法让多数家庭采用“华语”为家庭主要交流语言，更遑论其他只在本县、本镇、本乡流传的更弱势的方言。而真正有生命力的“方言”如粤语，亦毋需推广，自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成为区域内的主流语言。

**3、方言进学校，满足的只是上一代人的“乡愁”，对孩子而言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戕害。**无论课堂之上，还是课堂之下，都不应该成为方言的存身之所，学校需要维持一种好的语言环境，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普通话和英语。2009年，新加坡学术界曾发声，要求让年轻孩童学习方言，允许方言进入学校，以保存语言的多元化。当局明确回应：“尽管一些有语言天分的人可以掌握多种语言，但新加坡超过50年推行双语教育政策的经验，却显示大多数新加坡人很难同时应付华文和英文这两个语系不同的语言，这是政府不鼓励新加坡人再使用方言的原因。……任何一个新加坡机构或是南大[南洋理工大学]提倡学习方言，必然会损害新加坡人对华文和英文的学习，这是愚蠢的建议。”（12）

**注释**

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和政务院批复》（一九五四年五月），收录于《民族政策文件彙编 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P100-103。②周庆生，《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295-298。③《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55年10月14日，收录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年10月-1966年5月 第22册》，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3，P62。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信息化报告》，民族出版社，2011，P48。⑤同上，P49-50。⑥陈海伦、李连进/主编，《广西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调查与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P23。⑦⑧⑨⑩《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译林出版社，2013，P115-150。（11）周进，《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113-115。（12）《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译林出版社，2013，P146。

**杂交稻为什么难吃？答案在超级水稻的神话体系里**

**“一个被当作报复的希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最大程度上理解像袁隆平这个年纪的科学工作者，愿意相信他对解决粮食问题的初心真实而强烈。**

冰川思想库专栏作家 | 宋金波

4月17日，有媒体报道，在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上，“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透露，第五期超级杂交稻培育正攻关每公顷产量17吨。

这则新闻湮没在天量庞杂资讯中。

**超级杂交水稻曾经非常热，“上过书”，进过时事政治题。**每公顷产量17吨，也算重要进展。最初的超级杂交水稻，用了7年时间，才将亩产800公斤的记录提高到900公斤。2011年，袁隆平说，准备再用10年时间，在90岁时突破1000公斤大关。而每公顷产量17吨，折成亩产，已经有1130公斤。

袁隆平本人也是网红级的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首届国家最高科学奖获得者”。一个隆平高科，仅仅用了“隆平”，便财源滚滚。**袁隆平和超级杂交水稻，都已是价值不菲的大IP。**

争议一直有。包括杂交水稻稻种的可推广性，减产绝收问题，等等。有些不免关乎超级杂交水稻的价值究竟多大，又会变成另一个问题：对袁隆平的评价，是否过誉了？

我不预备直接得出结论。评价一个科学家的声名是否过誉，是很严肃的事，涉及太多参照系，有些必然因主观而失去意义。在这样一个社会，各种猛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生前身后名，变形失真，无人计较，甚至黑白错置。**与之相比，袁隆平是否过誉，简直轻若鸿毛——至少他还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并无作恶。**

**可以讨论的是某些拱卫其声誉的表述。这些表述未必出于袁隆平之口，也不一定合乎袁隆平本意。**比如这个说法：“他倾尽自己的技术和毕生精力，养活了14亿国人，拯救了地球整整1/5的人口；没有他的贡献，可能我们现在都吃不饱饭。”还有一些变体，像“培育出‘海水稻’，增产粮食500亿公斤，多养活约2亿人。”

袁隆平和超级杂交水稻还不能划等号，有很多其他团队的科学工作者参与了相关工作。但这一点暂且忽略。

**更重要的一点，超级杂交水稻究竟对中国粮食产量的提升起到了多大作用？**

多年来，超级稻试验田屡屡打破产量记录，超级稻的推广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但事实上，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全国稻谷产量就达到了18933万吨，然后在1997年达到20073万吨的高峰。但此后，在超级稻计划实行期间，全国稻谷产量却出现过显著下滑。

**超级水稻纪录可信，推广努力，但水稻品种的选择，还取决于良田、良法以及栽种意愿。**超级稻种植成本相对较高，成本利润率却低于常规稻。而且，超级水稻的口感评价也很低。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导致超级杂交水稻长期没有起到其宣称的作用。

在实操的角度看，超级杂交水稻近乎“屠龙术”，或者是“奥数”。**它诚然是一种具有潜在价值的研究方向，能体现出某些研究能力的优势，但不比常规选育和转基因技术更有价值——至少目前不是，在可预期的未来也不见得。**

所以，根本谈不上超级杂交水稻拯救了14亿人。中国近三十多年粮食产量的大幅提升，是建立在粮食生产商品化、市场化基础上，特别是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起到了关键作用。粮食品种选择，在其中是不那么显著的一块，而且恰恰没有多少超级杂交稻的功绩。

**至于“‘海水稻’多养活了2亿人”，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这种说法无异于把人当成某种养殖家畜，只要提供更多的饲料，就必然可以增加存栏数——饲料厂每增加饲料产能，就相当于“多养活了”若干畜只，并且还可以倒推，相当于“拯救了”这些原本根本不必存在的生灵，饲料厂的每一次加班增产，都可以就此宣布自己功德无量。

**此种说法，也完全无视超级杂交水稻科研开始之前，中国的粮食产量，早已经脱离了会饿死“2亿人”的境地。**

表述近乎荒诞，但很多人接受这套说辞。关于袁隆平是否过誉的讨论中，很多人用类似表述支持袁隆平——很像在黑队友。

是什么导致这样的说法能经久不衰地传播呢？这样一种浮夸之语，几乎与正常科研的对立面即“大跃进”的言辞性质接近，只是塑造“劳模典型”生产线的副产品么？

**不尽然。一个负责“典型”宣传的“笔杆子”炮制出夸张词句毫不意外，但在后续的进程中，官方选择并认可这一说法，民间接受并传播这一说法，都自有其内在逻辑。**

从官方来说，选择、认可此类说法的背景，是长期对“粮食安全”的强调。“粮食安全”作为一种概念，其实只是1994年，莱斯特·布朗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长篇报告后，才开始成为“显学”，并成为决策层的理论工具。

**当然，在此前或之后， “粮食安全问题”都是一种事实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饥荒频发，能大致保持全民基本温饱，都已经是盛世气象。近现代，粮食问题也曾给中国留下深刻教训。

**从政府的角度，任何饥荒都应该是极大的耻辱和污点。**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历史上政府比大部分国家都更看重农业生产，甚至不惜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所谓“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倒不一定是妄言。

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现状，基于不同出发点，当然还会有相异结论。不过，除非考虑严重战争因素，目前的国际市场交易，其实是足以满足中国主粮需求的。另外，即使是国内粮食产出，也被低估了，因为国产的很多主粮被用于酿酒等需求，而这部分粮食在极端状况下，很容易被转移出来。**此事话长，是另外一篇文章的话题，但总体来说，中国粮食安全的危险级别被大大高估了。**

除了历史传统的影响之外，很难对官方对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强调的用意做过多猜测，甚至是否有这样一种统一的意志都可存疑。**不过，逆向思维，可以看看长期强调粮食安全的结果是怎样的。**

**首先，它提升了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比如耳熟能详的“中国用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粮食安全的严峻程度如何，当然会影响这一说法的价值。

**其次，对于附着于权力的利益集团，比如说与粮食相关的一些国企、事业单位甚至管理部门，粮食安全局面是否严峻，会决定其存在的价值，绩效评价，资源支配能力。**类似的是，在独生子女政策调整前后，可以看到整个计划生育管理的行政管理体系，是如何用最高分贝强调“中国人口形势依然严峻”，论证“放开生育会造成灾难”的。

**对于粮食安全的强调，还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影响。一个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在这一底线政策下，对农村土地的管控益发严格——主要是对农民而言。**另一个影响，则是顺理成章地引导了农民不应离开土地的背景舆论。**农民工离开农村土地，农村耕地撂荒，在有些人眼中成为一种“危险事故”，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包括非市场的方式，加以矫治。在他们看来，农民存在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土地，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粮食生产。

**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阿玛蒂亚·森曾经指出，导致贫困与饥荒的并不是物资的匮乏，而是权利的失败。**即便是在粮食能够满足需求时，饥荒也能发生。吊诡之处在于，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仍然严峻”这一命题的认可，与对“当下中国已经远离‘权利的失败’”的否定判断，在逻辑上是同向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民间心理愿意接受“超级杂交水稻救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说法，更可能缘于普遍的饥饿记忆与恐慌。**

不说中世纪频繁发作的饥馑了，只说切近的，当事人也多还在世。中国195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抹去记忆。甚至直到1980年代初之前，除了个别大城市和富庶地区，很大一部分“70后”甚至少部分“80后”，恐怕都有或轻或重的饥饿体验。

**即便没有亲身体验，也会因为年长亲人的回忆而受到影响。**我还记得母亲多次回忆，1960年代初，我的三姨，每天守在村口，就为了从当村长的姥爷手中，能额外分得半块玉米芯磨碎做的饼。她因此成为姊妹们中最高最壮的一个。而当时在全国来说，东北是饿死人最少的地区之一。

很多年后，我才能理解虹影在《饥饿的女儿》中表达的意思。饥饿，极端的饥饿，可以饿死人的饥饿，普遍的饥饿，可以形塑亿万人群的心灵，可以造成无法痊愈的创伤**。如果说所谓原生家庭的伤害还可以通过自我努力而得以救赎、治愈，这种饥饿造就的心灵畸变，在群体意义上，可能是终生的不治之症。**

极端饥饿的体验与其他短缺（比如“缺少”智能手机）不同之处在于，理论上，它能够突破人性所能坚持的所有底线。中国民众在个人意义上很多行事风格，都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些记忆的影响。当这种记忆在大群体中发生作用，对文明的污染和损毁是深入骨髓的。在我看来，中国很多地域文明程度的差异，与数十年前相当一段时间里有无群体饥饿记忆有关，而与区域乃至民族文化关系甚小。**有没有直接的饥饿记忆，同样可能成为分别中国代际人群极为重要的指标。**

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有这样记忆的几代人，不会仅仅节俭终身以求安心，或疯狂购物以填满欲壑，他们也必然更容易相信，粮食的安全，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能有一口饭吃，比很多“华而不实”的权利与尊严更重要，同样，能在粮食的安全上有所贡献，比如袁隆平和超级杂交水稻，是无以伦比的功德。他们是无暇、无意也可能无力，再去对种种说法加以辨析的。**饥饿记忆的恐慌，塑造的是对粮食（吃饱而生存）的信仰，某种程度上，无关理性。**

“90后”将是第一代没有饥饿记忆的中国人，“00后”更不必说。他们终将拥有配得起自己的中国。**新闻遇冷的现实，表明“超级杂交水稻”的信仰正在崩裂，一个“饥饿的中国”，不是仰仗人心的自我救赎，而是依靠生命的新陈代谢而正在远去。**喜耶？悲耶？

在《饥饿的中国》中，穆旦这样写道：“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它说：我并不美丽，但我不再欺骗/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当多年的苦难以沉默的死结束/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然而只有虚空，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还要在无名的黑暗里开辟新点/而在这起点里却积压着多年的耻辱：/冷刺着死人的骨头，就要毁灭我们的一生/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作报复。”

**“一个被当作报复的希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最大程度上理解像袁隆平这个年纪的科学工作者，愿意相信他对解决粮食问题的初心真实而强烈。**

无论世界对他是否过誉，我已不忍再给他一句微词。